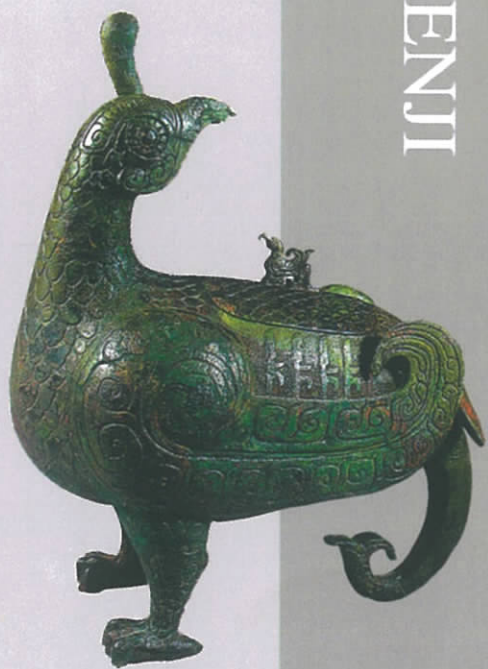


山西·曲沃曲村—天马遗址发掘30周年

晋文化论坛论文集

JINWENHUALUNTANLUNWENJI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山西·曲沃曲村—天马遗址发掘30周年

晋文化论坛论文集

JINWENHUALUNTANLUNWENJI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文化论坛论文集 / 曲沃县文化旅游管理中心, 曲沃县
晋文化研究会编.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457-0481-5

I. ①晋… II. ①曲… ②曲… III. ①文化史—山西
省—文集 IV. ①K2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9073 号

晋文化论坛论文集

编 者: 曲沃县文化旅游管理中心 曲沃县晋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 落馥香

助理编辑: 薛勇强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 - mail: sj@sxpmsg.com

网 址: <http://sjs.sxpms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临汾工艺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481-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山西·曲沃曲村—天马遗址发掘30周年晋文化论坛参会代表合影



一次别开生面 收获喜人的学术盛会(代序)

在“山西·曲沃曲村一天马遗址发掘三十周年晋文化论坛”上的总结讲话

李伯谦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代表和在座的各位朋友：

我们这次“山西·曲沃曲村一天马遗址发掘三十周年晋文化论坛”，我认为举办得非常好。

我是 1979 年跟随我的老师邹衡先生带领毕业班的同学前来这里实习的。从 1979 年到今年已经整整 30 年了。30 年前，我们选定曲村一天马遗址作为北大的一个实习场地，并且和山西省的文管会，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协议——晋文化及其渊源研究的协议。30 年来，通过艰辛的工作，曲村一天马遗址有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围绕着这些重要发现，我们已经开过四次学术讨论会。最早应该是 1985 年，叫作“晋文化座谈会”。当时，中国考古学会的副理事长即后来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主持了那次座谈会。第二次是 1994 年，在太原召开的丁村旧石器文化和晋文化的讨论会，规模比较大。第三次是 2002 年，在上海博物馆召开的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座谈会。我们这次“晋文化论坛”要算是第四次了。这足以说明，自 1979 年曲村一天马遗址发掘以来，有关晋文化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对于这次晋文化论坛，我想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我们这次讨论会与以往的讨论会有很大的不同，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的论坛当中增加了公益讲座。山西考古研究所的吉琨璋先生用浅显的语言，用生动的故事，把 30 年来曲村一天马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成果串联起来，向广大的公众作了一次非常好的讲解。这是中国文化事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也是我们考古学家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我们的考古成果理应惠及广大的人民群众，理应传播普及给广大的人民群众，理应与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在这方面，我想我们山西考古所已经走在前面了。这之前，汾阳发现了一批金元时期的墓葬，在那儿搞了一次讲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想这次反响不会比上次低。第二个特点，是我们这次学术讨论

会有很多我们曲沃当地研究晋文化的热心人参加。曲沃县委、县政府对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有高度认识,确立了“文化立县”发展战略,成立了晋文化研究机构。这次曲沃县晋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相互交流,用实践很好地体现了自身在推动晋文化研究与普及中的作用和价值。同时,我们这次会议还有国外对晋文化有研究的学者前来参加。另外,我特别注意到,还有很多媒体的朋友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盛会,他们绝不止是在开幕或闭幕式上拍个镜头,而是表现出对晋文化的极大兴趣,这反映出晋文化的研究愈来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曲村一天马遗址 30 年来发掘与研究成果的广泛影响。这都是我们这次论坛和以往的不同之处。

第二,就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来讲,可以说已经涉及晋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时间上来看,从西周、春秋到战国,上下跨越三个时期。从地域上来看,不仅涉及了晋国的文化,也涉及了分晋的韩、赵、魏三个国家及其相互之间的文化,同时还有秦文化。从内涵来讲,涉及面也比较广,取得的收获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一点,从汉朝以来,争论最多的“叔虞封唐”的“唐”究竟在什么地方,前人给我们提供了七八处。比较多的意见,是在现在的太原,以致吸引了很多的游人,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认为那是唐叔虞的封地。太原有一个晋祠,在晋祠的附近有一个坟丘,传说就是叔虞的墓葬。对此,山西考古研究所曾经组织人进行了挖掘,挖掘的结果证明它只是一个汉代以后的纪念性建筑。30 年来,曲村一天马遗址的发掘破解了这一疑团,证明了晋文化不是起源于太原附近,而是在霍太山以南的临汾盆地及其周围地区。这就改变了以往广大公众对晋文化的认识。第二点,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知道曲村一天马遗址是在四个自然村的覆盖之下,这就是曲村、北赵、天马、毛张。天马在翼城,其他三个在曲沃县,因此它的规模是相当大的,不是一般的聚落。这当中发现有居住遗址,就是活人居住的地方,有烧制陶器的窑,有铸造铜器的陶范,所以说它的内涵也是很多的。更重要的是,在曲村北边发现了 600 多座西周早期的贵族和平民的墓葬。据初步统计,在这个范围内还有近 1 万座墓葬没有挖掘。除此之外,是在北赵的村南发现了晋侯墓地。通过对晋侯墓地的发掘研究,我们可以说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有九代晋侯及其夫人葬在这里,也就是从第二代到第十代。这九组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我想除了最后一组即 93 号墓和 102 号墓,究竟是文侯还是殇叔,还有争议外,前面所列的八位应该说已没有争议。这不仅有当时的青铜器、墓葬的棺槨以及他们的陪葬品等等方面的研究,证明他们是连续不断的,而且通过对青铜器上面的铭文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九组晋侯墓葬是父子相继的。这样一来,在这个时期,有晋侯的墓葬,有这么集中的墓区,再加上我刚才提到的有居住遗址、铸铜遗迹等,我们就有比较多的理由、比较充分的理由,证明它是晋国的国都所在地。虽然“叔虞封唐”的“唐”还未找到,但从第二代燹父到第十代晋



文侯应该说都在这个地方。这些丰富的材料,使我们做出一个基本结论:曲村一天马遗址是晋国第二代开始到第十代的国都所在地。但是也还遗留了很多问题,例如,为什么到了第十代以后就没有了,这就必须联系羊舌墓地的发现。羊舌墓地发现了五座大墓,挖了两个,还有三个没有挖,将来是要挖的。因为从这几个墓葬的情况来看,从晋侯墓葬来看,中间是不可能再插入其他侯的。因此我们认为,羊舌墓地是继北赵墓地这九个侯之后另辟的一块墓地,它是曲村一天马遗址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个意见不是绝对的,但目前多数学者是这样认为的。第三点,天马一曲村遗址尽管有许多重要表现,但是还有许多学术问题没有解决,还需要我们继续调查、发掘和研究。学术研究就是接力棒,不可能在一个时期、在一个人身上完成。我们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发掘殷墟,即商朝最后的国都,到现在还在研究。殷墟的发现、发掘与研究是从1929年开始的,比较起来,殷墟是80年,我们才30年。殷墟80年了还有一些学术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更是如此。比如,叔虞封唐的“唐”如果不在这里,到底在哪里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讲过,“河、汾之东,方百里”,河,黄河;汾,汾河。东汉服虔又说在“汾、浍之间”,应该就在这个区域来寻找。现在有了一些线索,田建文主持发掘的浮山桥北先族墓地,即使不是,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出土的铜器铭文中的“先”,在陕西周公庙甲骨文中是和“唐”同版的。在临汾东边的庞杜,也发现了一些商周之际的墓葬,也有遗址存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线索,因此我们讲,如果能够有计划地在这个区域之内再做一些工作,“叔虞封唐”的“唐”就有可能找到。如果找到之后就更为圆满了。当然,作为始祖的坟墓是否是在“叔虞封唐”的地点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别的国家有归葬的习惯。齐国有文献记载,前五代国君死了以后不是葬在齐地,而是归葬到祖莹去了。但这些都不要管它,只要把“唐”找到了,那么晋国最早的头就找到了。第二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根据文献记载,晋曾经多次迁都,有的说七次,有的说六次。在我们的考古工作中,也形成了不同意见,比如有人提出来“三都两迁”,还有人说是五个,不管是几个,从考古学上来看,曲村一天马遗址到新田即晋的最后一个国都之间,至今总感到还有一些距离,有一些断线。不管其间发生了什么,都对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如何把曲村一天马遗址和侯马的新田两地从文化上衔接起来,再借助文献的记载,综合加以判断。如果还有一个都的话,这个都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是叫翼还是叫故绛,这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东西。第三个问题,晋国的范围问题。按照司马迁的记载,是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由曲村往南越过绛山发现了绛县横水墓地,往东在邻县翼城发现了大河口墓地,这两个墓地和曲村一天马遗址的年代是相同的,它们陪葬的器物没有太大区别,但都是东西向,从绛县横水出土的青铜器的铭文来看,晋国和邰国不是一回事,一个是姬姓,一个是媿姓。大河口发现的这个铜器上有霸国,至于是个什么姓,因为材料所限还不能搞

得很明确。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么小的范围内,为什么不一样,“晋”和“邰国”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是并列的,还是邰是晋所辖之下的?确实还是要进一步研究。从大的方面来看,在这些圈圈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文化存在?晋国和它们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在文化面貌上又有怎样的不同和相同?我想这都是有必要研究的问题。总而言之,尽管通过我们几代人的努力,出来不少成果,但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去研究,尤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需要我们做更多具体的工作。

第三,曲村一天马遗址作为一个重要的都城所在地,应得到很好的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是当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们祖先留下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都面临着各个方面的挑战。首先是经济建设,像南水北调,像三峡水库建设等,发现了许多的遗址,其中有些提早发掘,有的来不及了。还有自然的破坏,尤其是古遗址,风吹日晒,河水泛滥等等,遭到自然侵蚀。还有人为的破坏,如盗墓。我们1979年到曲村时还没有盗墓现象,但是1986年前后,一步迈下去就有两三个探孔。据说,白天身体好的男人就下地了,定好目标晚上盗墓。后来进行严厉的打击有所收敛,但还有很多。特别是从1986年开始,晋侯墓地的被盗,实在令人痛心。晋侯墓地发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和盗墓者进行斗争的过程。我记得1992年,当时形势已很严重,要抢救了,按照考古的常规,先做被盗的,然后再挖开没有被盗的,但是我们刚走几天,没有被盗的就被挖开了。好在当地的老百姓觉悟高,举报了,8号墓男性棺材的玉器被盗一空,其夫人墓M31因老乡举报被保护下来了。当时没有被盗的,是应该很好地保护起来的,但很遗憾还是没有保住,有许多重要的文物还是被盗去了。在我们清理的时候,盗墓者喝过的矿泉水的瓶子上日期都有。令人气愤的是,该墓地最早的一组墓114号、113号,是在保卫人员眼皮底下被盗的,谁盗的呢?据说破案了,就是内鬼。还有一些陪葬墓也没有饶幸存留,而且都是在有保护人员看管的情况下被盗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去年在曲村两户人家的房子内,分别向墓地的方向挖了80米和40米。2006年到2008年因盗墓共死了六个人。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一两个人的事,需要我们大家起来,需要我们广大人民群众都起来监督。我们盖博物馆更应有保护意识,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还有我们的青年学生,通过你们的宣传和行动,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最后,我强调一点,我们晋国博物馆的建设,不仅是我们的曲沃县的事情,而且是临汾、是山西的事情,是我们全民都应关注的一件大事,希望把我们的文化事业搞上去,给我们带来喜讯。

我们的会议是在曲沃县委、县政府,临汾市委、市政府,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文物考古所的共同参与之下举办的,会开得非常成功。感谢杨书记、张县长、程部长,还有其他很多县上的领导,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还有市里的几位部长,这表明当地的政府对我们的



会议和即将建成的博物馆的重视。还要感谢曲沃中学,曲沃中学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会场,这么好的环境,我们深受鼓舞。特别是看了同学们的跑操,我心情特别激动。我要说:“如果我再年轻 60 岁,我也要当这儿的学生,多幸福!”我不知道现在同学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郭校长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曲沃中学的广大教师和领导把学校办得这么好,使每个代表都倍受鼓舞。我还特别感谢曲沃县晋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很多是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能热心家乡的文化事业,我觉得非常可贵和非常值得尊敬。正是有了县委、县政府和其他主办单位的共同努力,有了晋文化研究会朋友的参与,有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的支持,我们这次晋文化论坛才开得非常成功,收获非常丰富。我最后代表主办单位向大家、向在座的各位表示真诚的感谢!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96 年出任“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2000 年至 2003 年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主要负责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明和夏商周考古研究。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目 录

一次别开生面 收获喜人的学术盛会(代序)	李伯谦 / 001
考古所见晋南西周国族初析	张天恩 / 001
道是无情却有情	田建文 / 012
关于曲村一天马遗址的几点思考	吉琨璋 / 019
天马一曲村墓地用鼎簋礼的考察	谢尧亭 / 031
颯公簋小议	王占奎 / 044
晋文化兼容性特征再探	商彤流 / 052
晋侯墓地出土的玉冠式造型浅析	张 奎 / 058
晋国早期都城浅议	杨秋梅 / 062
拂去千年历史尘封	
试论曲村一天马考古的重大意义	景元祥 / 066
羊舌墓地 1 号墓墓主再讨论	
——兼论古曲沃地望问题	孙永和 / 074
晋都新田城与晋文化的消解	段宏振 / 077
新郑韩都布局的考古学观察	马俊才 / 091
晋文化遗存拾零	
——浅谈曲沃地名渊源	常志年 / 107
自然环境与晋国的发展	张有智 阎海燕 / 112
从晋和戎狄的商业贸易看晋文化的整合	畅海桦 / 117
谋略团体在文公称霸中的作用	臧伟斌 / 124
晋国法律制度建设特点初探	李保平 / 129

走近考古 触摸文明

——曲村晋国遗址发现与解读公益讲座 吉琨璋 / 136

附录

来吧,我们一起触摸晋国古都

——曲村晋国遗址发现与解读公益讲座侧记 段树聪 / 153

曲村一天马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概况 刘 绪 吉琨璋 / 157

后记 / 189



考古所见晋南西周国族初析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张天恩

史书记载的山西周代古国甚多,异姓国族不计,与周室同姓者除晋国而外,尚有虞、霍、杨、韩、魏等。但在曲沃县曲村晋国遗址大规模发掘之前,山西的西周文化遗存主要见于洪洞^①和闻喜^②。自1979年以来,曲村一天马遗址^③、北赵晋侯墓地^④持续十余年的考古发掘,几乎找到了西周时期所有晋侯夫妇的墓葬,基本确定了晋国都邑的所在^⑤。

此外,近几年集中于霍山以南的浮山桥北^⑥、绛县横水^⑦、曲沃羊舌^⑧、黎城西关^⑨、翼城大河口^⑩等地,也发现了重要的西周墓地,增加了更多全新的资料,使晋南西周考古异彩纷呈,为周代历史文化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许多研究课题随之开拓,也显示了晋南在当时的重要地位。相关的研究成果已初步揭示这些墓地可能与一些古国族有关,是了解西周分封制度和国家体制的重要资料,本文拟参照有关历史记载,对此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异姓封国的有关发现

(一)帝尧之裔国

有关研究虽曾探讨过周人最初有可能起源于晋南的问题,至今却依然未得到任何考古资料的支持。但这一带曾为尧都、夏墟的说法,几乎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襄汾陶寺遗址及古城的发现,多数学者倾向其与唐尧文化有关。而夏县东下冯遗址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大家均认为是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崛起于泾渭地区的周人开始涉足晋南,文献记载得较明确的是在西周初期或略早的时候,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掌故当然是西伯戡黎了。

关于这一历史事件,最早见于《尚书》,“西伯既戡黎”为其一章。西伯是指周文王。戡,注家释为胜。黎,则为商代小方国。《说文》释其地望云:“黎,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史记·周本纪》载文王受命,也就是决虞、芮之讼后的第三年,曾“败耆国”。《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几’。”《正义》:“即黎国也。邹诞生云本或作‘黎’。孔安国云:‘黎在上党东北’。《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国也,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尚书》云‘西伯既戡黎’是也。”据各家注释

可知,《尚书》的黎国,就是《周本纪》之耆国,《殷本纪》作“饥国”,居地在上党黎城县。上党为现在长治之古称,又曾名潞州,今黎城县仍隶属长治地区。

因为上党地处流经商都安阳附近的漳河上游,且相距不过百余公里,故文王胜黎后引起了殷商大臣祖伊的惊恐,而奔告殷王帝辛。若当时之黎确处黎城的话,说明周人进入晋南的时间可早到灭商前数年。戡黎自然是一种冒险之举,但周文王肯放胆一试的目的,明显是出于灭商的战略需要而对殷商统治集团反应的试探。另外,商纣当时正对东夷用兵,可能无力顾及西方之事。

但毕竟有距离迫近的问题,所以过去研究者对此多有怀疑,认为灭商以前周人不大可能将其势力扩张到殷都附近。

历史上有些事情可能确有令今人难解的地方。近年,黎城县西关村近百座西周墓的发现却提醒了我们,关于此问题可能还需要仔细考量。西关村墓地并未全面发掘,但据清理的部分墓葬分析,其年代为西周中晚期。现保存有三座带墓道的大型墓,中型墓 M8 出土的青铜壶铸有铭文,表明作器者是“楷侯”^①。“楷”,研究认为与“饥”、“耆”、“黎”古音相通,楷侯实即“黎侯”、“耆侯”^②。可见黎城在西周时期确有一黎侯国,地望与国别既吻合,可见戡黎之事发生于此亦非虚谬。

墓葬年代在西周中晚期,当然与商后期之黎的年代不符。其首先是因发掘墓葬过少,未能清楚反映时间范围,也可能是因水库淹没的缘故。但我们都知道,周代的封国往往是建于原有国族的旧地,故西关村的周黎应当就是在商代黎国故地上所封之诸侯。

关于西周之黎建于何时,文献是有明确记载的。《吕氏春秋·慎大览》云:“武王胜殷……封帝尧之后于黎。”这就是说,在武王灭商之后,黎即被封。西关村的发现可以说明黎国的地位相对较高,被封为诸侯。《史记·卫世家》记载卫顷侯为了让周夷王将卫国改命为侯,曾厚赂周夷王的记载就能表明其中的差别。又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纪》“帝尧陶唐氏,祁姓也”,知西周黎国应为祁姓,希望能得到西关村后续考古发掘的证实。

依据这些记载,我们就可以相信,周王朝将帝尧后裔封于此地,可能是考虑其原居晋地,更熟悉情况。西周早期封为诸侯的主要是周室同姓和姻亲重臣,封黎为侯说明了周人对尧后裔的倚重和信赖。

(二)商遗之先族国

近年,晋南浮山县的桥北村遗址也有一些重要发现,遂被认为也可能是与帝尧后裔有关的西周封国。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了一批商周时期的墓葬^③,其中有 5 座带墓道大墓及 9 座中型墓的年代,被认为属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以前的墓葬。尽管因被盗掘,出土文物不多,但



年代特征还是较清楚的。其有殉人、带腰坑等特点与商文化墓葬相似,不同于关中以及晋南曲村一天马遗址为代表的周文化。主持发掘的田建文先生依据墓葬特征、存在的年代范围,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等,认为桥北发现的可能正是商代晚期唐国的墓地。并据《史记·晋世家》“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封叔虞于唐”的记载,说就是周公所伐灭之唐^④。

但因桥北墓地被盗的文物中屡出带“先”字族徽的铜器,就致使这一推论出现了变数。因为殷墟甲骨文的商代族名中也有“先”,故桥北可能就是该族的居地。在未能将先族与唐国关系合理地联系在一起之前,就难以排除“先与唐虽同在晋南,但两者并非一地”^⑤的可能。

另外,桥北墓地具有浓郁的商文化特征,看不出太多的地方特色或说是唐文化因素。我们已考证了黎城西关村墓地可能为唐之后裔,从后者墓葬没有见殉人等习俗来看,倒是与晋国墓地更接近,与桥北墓地的差距反而较大。同是唐尧之后,相距不远的两处墓地应不致有这样的差别。由此可见,桥北为商遗族墓地的可能性更大。

二、姬周同姓封国

随着平定三监之乱、东征等战事的结束,周王朝开始了对晋南地区的有效扩张,标志应该是对晋国的分封,但灭商之后可能已经开始。

(一)徙封的虞国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晚年曾发生过虞、芮争讼的事。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国也。故芮城在芮城县西二十里,古芮国也。晋《太康地记》云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陕州河北县约为今山西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的芮城、平陆县境,故两国可能在今芮城县一带。

不过,关于虞、芮两国初居地是否确在山西芮城,近期有较大争论,或以为在陕西陇县及甘肃华亭境内^⑥。其说是否可靠,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没有必要继续深究,但很清楚的是虞在周初曾受封于大阳、河北殆无疑义。《汉书·地理志》记载:“大阳,吴山在西,上有吴城^⑦,周武王封太伯后于此,是为虞公,为晋所灭。”说的就是著名的历史故事“假途灭虢”时因借道而亡的虞国。大阳邻河北。《汉书·沟洫志》曰:“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为北吴,后世之谓之虞。”

有关虞国遗存虽没有突破性的发现,但有关的考古也提供了重要线索。《史记·晋世家集解》引贾逵曰:“虞在晋南,虢在虞南。”按晋军从曲沃一带欲伐虢,芮城、平陆当然为必经之地。虢国故地在河南三门峡市已被考古发掘证实,其黄河北岸的平陆一带有虞城应无可疑,不然何以有假道之谋的产生。考古调查在今平陆县张店镇西发现周代古城遗址,被认为可能就是虞城,应予密切关注。

虞国地望既定,就与黎国一起勾画出西周初年周王朝向晋南扩张的基本线索,大约首先是沿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一线伸展的。

(二)晋都考古与始封地的推测

北京大学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曲村遗址和北赵晋侯墓地的发掘,晋都旋被确定,对晋文化也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曲村遗址的西周文化遗存被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又分为前后两段。曲村西周墓地被分为六段^⑧,归于早期者也包括了第一、二段。不过,报告没有对不同段更确切年代的交待,西周早期最早遗存的时间界限并不具体。参加曲村遗址发掘的主要专家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先生就说过,“天马一曲村遗址虽有早至成康时期的遗存,但其绝对年代能早到什么时候,并无确切的结论”^⑨。仔细观察报告所提供的第一段鬲、罐、簋等典型陶器,可以发现与关中地区丰镐、周原等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早段的同类器尚存在一些差异。

曲村第一段的陶鬲有一些为瘦高体的,属于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基本特点。但其口沿外撇甚至微外卷的现象比较普遍,颈部束敛程度较明显,或有出肩感觉,与关中这一阶段的陶鬲口沿普遍斜侈,束颈和出肩不明显等均有差别。曲村的仿铜鬲已占一定比例,在关中也是不见的。曲村从未见到沔西、周原等地一些西周早期早段墓葬、居址出土的高领鬲、侈口分裆鬲等。

曲村一段的陶罐几乎均为圆肩罐,与关中西周早期早段的同类罐比较接近。但体显高,似有自身特点,不见周原、沔西等遗址、墓葬常见的矮领罐,甚至折肩罐等。当然也未见在关中此阶段部分遗迹单位中所出肩饰方格、菱形印纹的陶罐,这些保存了先周晚期陶器风格的标本。

曲村出土的陶簋多为商式特点,宽折沿外侈,普遍圈足较高,显然不同于殷墟四期陶簋。周原、沔西周初常见的商式簋明显与殷墟所出保持了一致,略晚才有一部分呈宽斜沿、圈足增高的标本。曲村所出显然是传承了关中同时期略晚的商因素陶簋特征。

总体而言,曲村西周遗址第一期一段的陶器,更多表现的是关中西周早期后段的风格,仅有少部分早期前段的特点,似乎可考虑对曲村第一段的年代进行调整,定为关中西周早期后段可能更合适。以此年代范围观察曲村墓地早期铜器墓,以及北赵晋侯墓地最早的 M114 组墓,都是比较契合的。

M6081 属于曲村墓地最早的墓葬之一,出有一些商末周初的铜器,但也明显有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晚的尊、卣等,故其年代不可能到周初。其他如 M6069 等墓,虽有周初之器,但主要为早期偏晚的铜器。北赵晋侯墓地 M114 虽出土了可能是晋国始封之君叔虞的方鼎^⑩,但该组墓出土的其他铜器、陶器特征明显较晚,故被认为可能已到西周早中期之际,墓主或有可能是晋侯燮父夫妇^⑪。

这些情况都反映了一个问题,曲村一天马遗址开始的时间很难早到武成时期。虽然邹衡



师当年曾有晋的初封地可能就是曲村一天马一带的看法^②，李伯谦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的认识^③，邹师甚至提出曲村墓地四鼎墓 M6081 为叔虞墓的怀疑^④，但除了 M6081 的年代比较接近叔虞的活动时间外，遗址内可企及成王时代的西周遗存似乎非常稀少。

故自鬲公簋面世后，朱凤瀚、李伯谦先生等均开始怀疑叔虞初封之唐，可能非曲村一天马遗址，而是另有其地^⑤。根据笔者对遗址文化遗存的分析，晋之始封地在这里的可能性确是非常之小。因为叔虞初居封地时必然要统率众多的人口，除了关中以姬、姜族群为主体的周人外，可能还有其他归附周王朝的人群，自然还包括所谓“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等。虽然笔者主张诸侯国的卿大夫们都有自己的采邑在国都以外^⑥，但都城内一定会有其住宅。所以，晋初居地不可能没有大量人口入住后所形成的文化堆积。特别是这类因分封迁徙人群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因素，不会在进行过多年考古发掘，揭露面积达 1.3 万多平方米后仍未发现，其必然是不存在于此，故应另作他求。

叔虞之封在成王时期，文献记载中是比较清楚的。《史记·晋世家》载：“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封叔虞于唐。”这说明叔虞之封还是比较早的，最大的可能是在东征结束，封康叔于卫，东土大事粗定以后。受封的一个重要契机，则是晋地之唐国发生了动乱，周公率军平乱并顺势灭之。周王朝经营东土时形势严峻，根本无暇他顾，但当缓过手来，准备向其他地区扩张之际，唐乱恰给予了周公这个政治家一个可乘之机，周王朝对晋南的经略，遂得大举。

唐之地望，《史记·晋世家》说：“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邹衡师于此有过详细论证，说：“霍山以南，绛山以北，汾水以东，浍水以西方圆百数里的范围内，很有可能就是《晋世家》所谓‘方百里’。”^⑦不过这个范围较大，要寻找还是很不容易。

曲村的考古遗存满足不了始封年代的要求，我们认为桥北也不是唐墟，那就需要对其他含有西周早期遗存的大型遗址进一步研究。晋南含有西周早期遗存的遗址尚有不少，如洪洞县的坊堆、永凝堡^⑧，侯马的上马^⑨、翼城县的大河口、苇沟—北寿城等。这些遗址及曲村一天马所含的西周早期遗存，首先表明周王朝在这一时期已全面掌控了晋南汾河平原的事实，并在其偏晚阶段已形成了曲村一天马为代表的核心聚落。其次，这些遗址多在河、汾之东的范围，作为晋之始居地的地理条件都已具备，但规模偏小了恐不可能。

现知曲村一天马之外规模最大的就是苇沟—北寿城遗址^⑩，其也是以邹衡先生为代表的不少学者曾重点考虑的对象之一，但因没有特别重要的发现渐为大家忽略。从现有不多的出土物观察，确没有超出曲村遗址西周第一段遗存的标本，似乎也不足以当叔虞所封。但该遗址范围南北 2000 米、东西 1000 米，规模仅次于曲村一天马，年代又比较一致，还出土过战国“绛亭”的陶文，都是非常重要的迹象。周文王自岐迁都于沔以后，岐邑周原遗址在西周一代

仍为重要都会，繁华不让泮镐，大量的重要考古发现和青铜器窖藏的存在就是证明。

苇沟—北寿城会否同于关中之周原，也不可不考虑。否则，在晋都之侧的数公里之内就有一座同时期的大型聚落，似不好理解。如是晋国卿大夫采邑的话，几乎形成“大都耦国”的局面，岂非不经？《晋本纪》记载晋孝侯封桓叔于曲沃，因曲沃邑大于晋都，招致议论说：“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但作为故都，由国家统一管理，则不存在问题，而类同周原与泮镐的格局。所以，将来对苇沟—北寿城进行一些考古发掘，还是有必要的。

另外，临汾市庞杜曾发现过商末周初的青铜器，也有遗址。李伯谦先生建议在此做些工作，也许会有收获^③。这应是一个重要的线索，不可轻弃。

（三）姬杨的建立

因为有历史文献的线索，洪洞永凝堡等遗址可能属于杨国，基本得到学术界的认同，所存在的问题尚有杨国为姬姓还是媯姓的争论。认为属于姬姓者依据《左传》等文献立论，相信杨国出自周或晋。主张为媯姓者据北赵晋侯墓地 M63 出土的两件有铭文的“杨媯作羞醴壶”，认为杨媯是媯姓杨国之女嫁作晋穆侯夫人者^④，为避免文献杨为姬姓的矛盾，提出了先有媯姓之杨，后封姬姓之杨的看法。

陕西眉县杨家村铜器窖藏四十二年逯鼎铭文记载了周宣王命逯的词语，有“余肇建长父侯于杨”等语。肇建，为初建、初立之意。“侯于杨”就是封于杨地为诸侯。王辉先生研究铭文中的“长父”与尚父通，正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杨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为杨侯”所记吻合，证实了杨为姬姓，初封于宣王四十二年^⑤，是非常有见地的看法。

但永凝堡等地发现有西周早中期的文化遗存，与《新唐书》、逯鼎所记却无法兼容，故在尚父封杨以前曾有一媯姓杨国之说不是没有可能。依《晋世家》记载，宣王四十二年为晋穆侯逝世的前一年，夫人来自早先之媯姓杨国也无不通。此杨可能就是在晋始封时所建媯姓之国，也是杨媯所来的母国。

三、其他族姓的遗存

（一）横水侂氏墓地

绛县横水是一处规模较大的西周墓地，保存状况良好，勘探发现 300 余座墓，有带墓道的大墓三座^⑥。从出土文物来看，墓地的年代约为西周早中之际到西周晚期偏早的厉王时期。墓葬方向为东西向，有殉人、腰坑，墓的四角有斜洞等特征，与晋及关中等地其他姬周系统的墓葬形式有较明显的差别，也与可能属于商人的桥北墓地等不同。

大墓 M2 铜器铭文有侂伯作宝鼎等内容，应是“侂伯”为自己作器。M1 出土的铜器上铸有